

内部发行，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研讨实录

第 53 期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2201室 Address: Rm.2201,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四年七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活动了 90 多次，成为了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 年和 2010 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胡旭昭' (Hu Xizhao),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基金会最近两次学术研讨活动的记录，分别为第93期发展沙龙曹远征先生关于“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演讲，第94期发展沙龙马德斌先生关于“大一统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演讲。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先生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立足点正在发生变化。当前政府认识到，中国经济正在告别两位数增长，下了一个台阶，但核心问题就是在新的台阶上是否能站住。基本的立足点是认为短期经济波动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有秩序的稳定增长，这就需要结构调整。于是，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要短期长期相结合。从长期来看，要增加就业收入，要科技创新技术进步，要加大资源环境保护。从短期来说，宏观增长要有一个合理区间，有一个预期调节，有一个警戒线，上限就是防通胀，下限就是稳增长，底线就是稳定，上限与下限的中间来做一个短期宏观调控。调控的目的是为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创造条件。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德斌先生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历史的差别。欧洲分裂为多个国家，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乃至战争，带动了国家制度的建设。中国虽然不缺少战争，但最后导致了中央集权一体化的大一统。大一统在中国的一个很

大的结果就是贵族制度的消失，中国通过建立一个官僚体系，用等级制度取代了分封制度。他认为，今天中国最诱人的一点恰恰是一个大一统，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历史这么悠久，最后大家能够都说普通话，这个大一统能带来市场上的很多好处。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日

目 录

曹远征 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形势与政策展望.....	1
提问与讨论.....	24
马德斌 大一统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	34
提问与讨论.....	54

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形势与政策展望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上海新锦江大酒店 2014年5月29日

乔依德：各位来宾，大家安静一下，我们沙龙的演讲现在开始。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给我们做演讲。曹远征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获得经济学博士，担任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已经16年了，这在中国经营界的首席经济学家中好像是历史最悠久的。他很多观点也广受关注。可能领导层也关注，下面做实体经济的人也关注。我就不多讲了，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曹远征给我们做关于“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演讲，大家欢迎。

曹远征：谢谢乔依德秘书长，非常高兴能到上海来。刚乔秘书长说只有45分钟给你演讲，更多时间留给大家讨论，所以我简略一点。我给大家准备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增长模式的变化，出现了中国宏观经济特殊的问题。第二，怎么来理解这个特殊的问题，包括我们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趋向和做法。第三，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什么？这些意味着什么？第四，还要讲讲上海自贸区的安排，是什么样的地位。

我们知道，去年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产生了很好的一个决议，60条，336项改革措施，七年内完成，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现代化。从长期来说，这是中国经济

可持续发展必须要采取的措施，但是对短期来说，它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周期。最重要的一点，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投资推动的，而投资中政府的投资又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投资，而地方政府投资是又靠负债来进行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很多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政府要退出市场，政府投资的意愿、投资的持续能力都开始发生疑问。你会注意到，经济开始在下行，同时还有一个风险因素，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负债能否持续，这是今年宏观经济特别重要的两个问题。我们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2020年完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四个原则，第一个是市场决定作用；第二个，市场应该是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第三，这个市场体系是面向全球的而不是封闭的；第四，市场经济、司法行政应该分离，独立检查审判权是法制的保证基础。其结果是改变中国传统型增长方式。

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意愿受到约束，改变了中国经济的投资，尤其是依靠政府投资的增长方式，从而改变了经济周期。我们来看怎么改变的。第一，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去年前三个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仅为45.9%，而投资贡献率又升至55.8%，一旦投资下降，经济是否会进一步下行？第二，这个投资主要依赖于负债，现在M2对GDP比例接近200%，除企业负债水平较高外，与土地财政相关的地方债务也备受关注。我们注意到，今年地方债务的年到期约占20%以上。人们担心一旦债务不可持续，经济下行还会加速。这就是宏观经济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全球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而且很多国外投行

已经在预测中国经济可能会硬着陆。什么叫硬着陆？在我们理解中这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经济快速下行，引起就业问题严重化，导致社会不稳定。第二，由于债务的不可持续性，出现债务危机，从而导致经济困难。这是两个硬着陆最重要的指标。

观察中国经济，我们认为有下行的风险，而且应该说硬着陆的风险也存在，但是中国经济不大会硬着陆。也就是说，依照上述两条来观测，你会发现，经济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两条线上观察这个问题，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另一个是债务持续性。如果从经济增长速度观察，中国就业弹性大大提高。在 2008 年的时候，我们说要保增长，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如果经济增长不能达到 8% 以上，那么我们 2 千万农民工会到农村去。但是你注意一下，去年经济增长 7.7%，新增就业机会 1310 万。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过去 GDP 一个点能提高 120 万到 130 万就业机会，而到现在能提供 170 万到 180 万。这是两个原因构成的，一是中国的服务业开始占最大比重，成为第一大部门，服务业就业弹性比较高；二是中国人口也在发生变化，新进劳动在下降，就业率大大缓解。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如果说就业是硬指标，要新增 1 千万就业机会，那么按这个测算，6% 的增长速度就能完成新增 1 千万的就业机会。所以经济速度下行，好象压力并不大。从 7.5% 到 6% 之间，有相当大的空间，有很大的弹性。那么，今年宏观经济政策跟 GDP 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再说债务可持续性。我们注意到债务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宏观经济周期的波动或者经济下行，企业的负债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坏账在增加，反应在银行中就是坏账水平

在提高。比较一下，去年年末到今年一季度，这一个季度坏账增长 500 多亿，尽管中国坏账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1% 左右，但是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人们担心在产能过剩、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企业的负债是不是难以持续？中国的负债率是非常高的，大概平均在百分之一百几，债务能否持续，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是和中国影子银行相关，而影子银行又和很多房地产相关，影子银行的债务是不是可持续？我们注意到，信托的融资成本都在百分之十几，那么它是否可持续？第三，更重要的就是地方的债务问题，是否可持续？其实，人们更担心的是第三个，地方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的。

我想把地方政府可持续问题做一个描述，比较一下国家审计署 2011 年的审计报告和 2013 年对地方政府的审计报告，读出这么一些信息。第一，中国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债务，总体水平不高。中国政府的总负债占 GDP 比例不超过 40%。如果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盟标准来衡量，距离一国国债占 GDP 不超过 60% 的标准，中国还差地很远，所以负债不是很高。但是有一个问题，它集中到期的风险非常明显。按照 2011 年审计的数字，地方债务 48.85% 发生在 2008 年以后，那就意味着它有一个到期高峰，今年要偿还 22%。第二，看债务的结构。中国地方政府的三级负债，是省政府、市政府和县政府。2011 年的审计表明，中国 2779 个县，只有 54 县不负债。2013 年的审计表明，到 2013 年 6 月，什么债务增加最快？县级政府负债增加最快，每年平均增长 16%。县级政府的债务又跟出让土地和房地产高度相关，如果房地产价格下行，会让债务严重化，债务可持续性就变成一个新的问题出现。这是今年宏观经济新的变量和新的因素。从债务可持续性来看，如果投资进一

步下行，首先带来的问题，不是说就业能否增长，而是没有新的现金流能补进去，债务的可持续性就会有问题。会不会出现系统性区域性的金融风险，这是关注的重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出一项任务，就是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从这个上说，投资必须得维持在一定水平上，现金流不能断掉，才能得到维持。我们特别注意到，这对政府财政收入提出苛刻要求，如果在土地卖不出去的情况下，就更依赖于正常的一般性产能收入，那么就要对 GDP 速度有依赖。而中国过去的情况表明，在财政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财政是速度财政，即如果今年 GDP 经济增长速度超过 8%，那么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快于 GDP 增长速度，如果 GDP 增长速度低于 7%，那么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慢于 GDP 的增长速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要满足充分就业这个目标，6% 以上的经济增长就能维持。但是，如果要满足债务可持续性，至少得维持 7% 以上。所以我们讨论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人们不再讨论跟充分就业相关的宏观经济活动，而更多讨论和债务可持续性相关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今年的金融安排变成最核心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现实表现有很多的数据，这个不讲多了。大家都知道。一直有下滑压力，现在下行压力还在加大。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怎么来理解中国的宏观经济？宏观经济这样维持，出路在什么地方，维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怎么观察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大家看主要需求拉动 GDP 增长（图 1）。其中绿色的就是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红色（下面的部分）是最终消费，灰色是资本形成总额（中间的部分），通常叫三驾马车。如果从短期需求来看，从上世

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逐渐走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绿色的出口对 GDP 的贡献越来越大。2008-2009 年 GDP 有很大的下滑，大家都看到，就是 2009 年出口负增长，连续五个季度大负增长。出口对 GDP 有重大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出口部门是就业密集部门，一旦出口出了问题，就业就会出问题。这就构成保增长的理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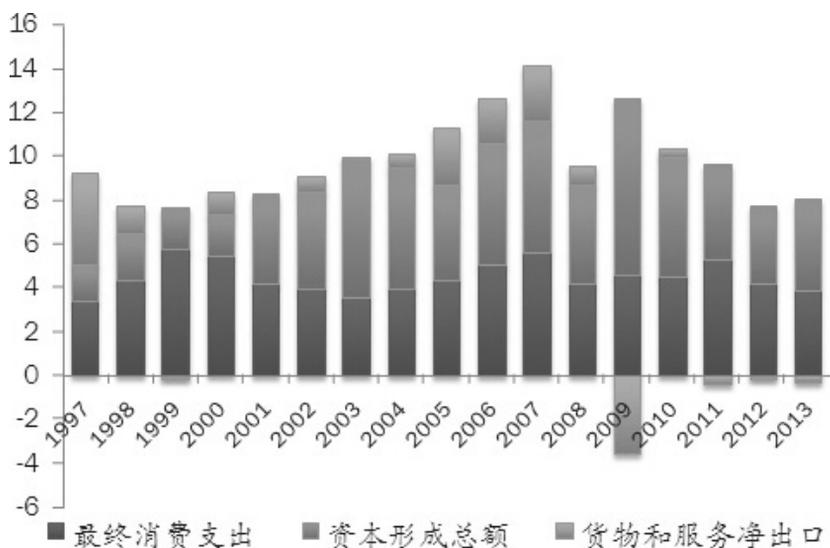


图 1: 主要需求拉动 GDP 增长

怎么保增长，大家看 GDP 的收入结构（图 2）。大家看红色的（下面的部分）是劳动报酬，劳动报酬到现在，绝对收入一直在提高，但是相对比例在下降。道理很简单，政府的收入快于 GDP 增长，这当然意味着居民收入在 GDP 比重在下降。这个下降就意味着，如果你要保增长，靠居民的消费是有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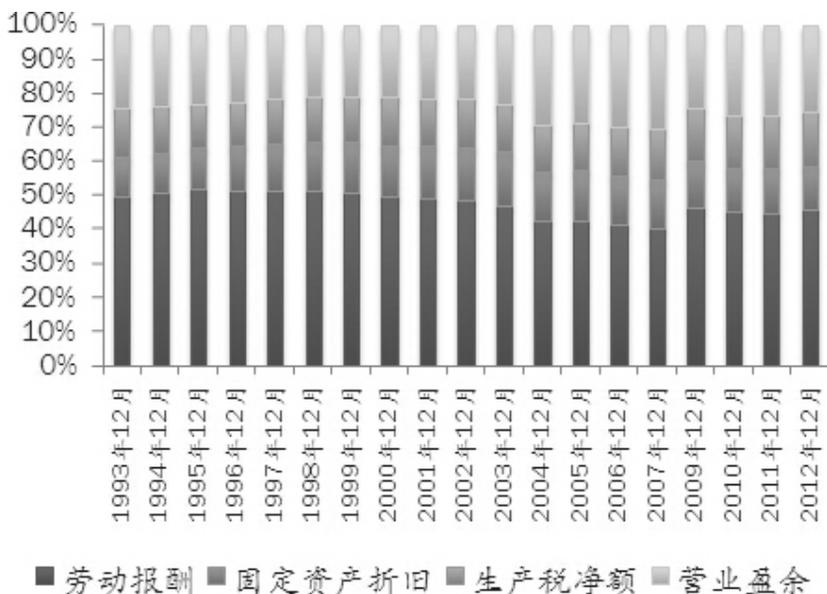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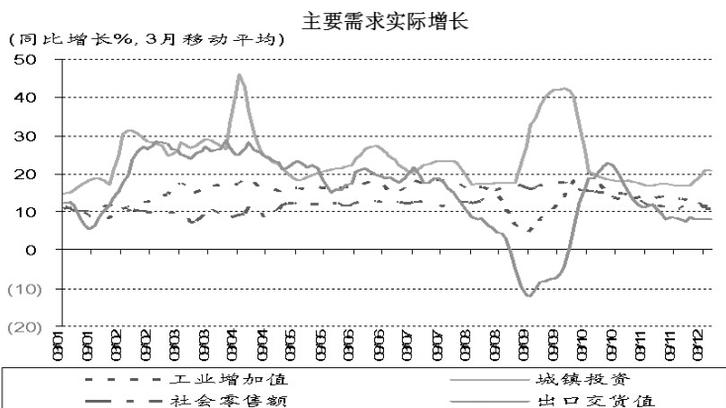


图 2: GDP 收入结构



◆ 出口引领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出口和投资的相互关系上：不是出口增长带动民间投资，就是出口下降迫使政府扩大投资。

图 3: 出口引领导致了投资波动

资料来源：CEIC，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扩大投资。这就出现了这样一张图（图3）。灰色的线（下方的实线）是中国的出口，红色的线（上方的实线）是投资，如果你仔细看就可以看到，在应对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投资和出口的形状几乎一样，却是相反走向的。2008-2009年，投资大幅度扩张，就是常说的“四万亿”。现在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就是那个高峰能否持续，然后能否熨平，现在经常听到说这是政策的消化期，就是那个红色的高峰能否消化掉。

但我们想说，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中国经济很重要的一个规律性的变化，就是说，中国经济是出口引领型经济，它主要表现在出口和投资的关系中间。中国的民间部门主要在两个领域，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出口。出口增长，民间就扩大投资；出口订单少了，人家就不投资，甚至撤资。这时候，由于出口部门对就业和GDP增长很重要，政府就不得不投资。出口好，民间投资旺盛；出口不好，政府就扩大投资。于是“出口引领”导致整个投资的过度。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屡次出现。大家都记得很清楚，1998年，十几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出口遭受严重的困难，民间投资意愿低迷，整个经济增长变缓。政府这时候不得不出台刺激投资的办法，其中主要就是政府投资。中国的高速公路就是那时候修的，怎么修的？大规模国债发行修高速公路，中国政府负债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过去我们讲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大规模国债发行是从那时候开始的，然后带领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第二次是反过来的，大概发生在2005年前后。2002年中国加入WTO，出口开始大幅度增长。你观察一下中国外汇收入，就会发现2004年是决定年份，2004年外汇突然跳起来涨，当时我还在国家中央政府部门工作，我们为外汇

很头疼的。在 1990 年代末期，那时候我们外汇储备大概还不到 1 万亿，现在 4 万亿，都是在过去 10 年里涨起来的。由于出口大幅度增长，订单大幅度到了中国，于是民间投资额高涨，为订单而生产，为订单而投资，经济有过热之嫌。宏观调控这个词，是 2005 年发明的，从那以后，中国始终处在宏观调控之中，到现在 10 年了。这个宏观调控，就是要控制投资，除了控制政府的投资，民间投资也要控制。如果市场的手段控制不了，就用行政手段。大家都知道的，最著名的铁本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那是在 2005 年，江苏的民营企业为了出口钢铁，投资钢铁行业，钢铁产能过剩，被强行下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次，是 4 万亿。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跟过去是一样的。第四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出口增速大幅回落，降到了个位数，用投资维持增长的呼声又再度高涨。

我们可以看看过去几年的情况变化。大概 2010 年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增速是 30%，2011 年是 24%，2012 年就是个位数，去年又是个位数。这时候是不是要维持经济增长？如果要维持，是不是就要靠投资？每年到这个时候，5、6 月份，这种呼声就会再起，2012 年是这样，2013 年是这样，今年发生更早，在 2 月份就开始出现了。大家注意到了上个月广交会的订单变化。

这就构成了从 1990 年代到现在的出口与投资的关系，从这个关系中也可以看出一把钥匙，什么钥匙？理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把钥匙，如果中国经济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这个规律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现。什么规律？就是说，在消费增长稳定的情况下，出口扩大时，带动非国有的投资，拉动 GDP；出口下降时，为拉动经济应对产能过剩，

国有部门就必须扩大投资。长期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决定短期宏观经济运行的出口引领特征，并日渐形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宏观经济被迫锁定在出口波段上，控制投资作为应对波段的手段，而使用的工具主要依赖于国有部门的投资，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我们说，如果中国经济不发生重大变化，这个特征，这个规律，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现。由此说，转变经济结构就变得非常重要，只有转变了经济结构，宏观经济的特征才会消失，宏观经济政策才有独立性。

什么是中国经济结构？如果我们把十一五计划回顾一下，就能看到中国的经济结构，在十一五计划中间的 22 项指标，8 项是约束性的，14 项是预期性的。在 14 项预期性的指标中，有 11 项已经完成。温家宝总理在 2011 年 3 月 5 号，对十一五计划的总结中说，有三项没有完成：服务业增加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占 GDP 的比重。这里我不想讨论为什么没有完成，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完成的都和服务业相关？它凸显了中国经济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中国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以制造业、工业为基础的国家，是工业高度外向型，出口导向的。要改变这样一个结构，就是要一二三产业均衡发展，重点发展服务业。内外需要共同提高，核心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重点是扩大消费。这就变成十二五计划的基本依据，在十二五计划中间要实现这么一个转变，就必须要有改革。这就是十八大三中全会的 226 项改革的基本客观估计。这个结构调整对中国来说变得非常重要。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过去在中央政府部门工作，结构调整说了很多年。我们在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提结构调整，

那时候叫两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到集约性，运行方式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十几年以后，我们还是在讲转变。那么就有一个问题，这个转变，能转变过来吗？政府一号召就转变过来吗？但是我们发现这次是真的，并不在于政府号召什么，而是中国经济增长基本因素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构成了中国经济下行最终的原因。是哪几个变化？

第一，我们看到，世界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预示着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维持，必须转向内需扩大。这个我就不想多说了，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沿海的中小企业遇到很多问题，像我们旁边临近的浙江省遇到的问题，很多表面上看是融资的问题，但核心是这个问题。我们温州的那些中小出口企业，人家也说的很对，以前遇到冬天降温，咬牙挺过去，到春暖花开时，又是一马平川。但这次金融危机，似乎冬天不太冷，但是时间太长，熬不住了，资金链断了。有人说，没有良心的跑路，有良心的跳楼。表面上看是融资的资金链断掉了，核心是出口导向型经济遇到严重障碍，过去出口好像是无限制的，只要你能生产出来，但是现在看来，市场真是有限的，这是重大的变化。

第二，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正在削弱，特别是劳动力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削弱。这是我们做的调查统计（图4），大家看曲线，那是外出农民工占乡村青壮年的比重。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45岁以下一半左右的青壮劳力已经离开农村。如果年龄上再做一个区分，25岁以下，几乎70%到80%，都不在农村。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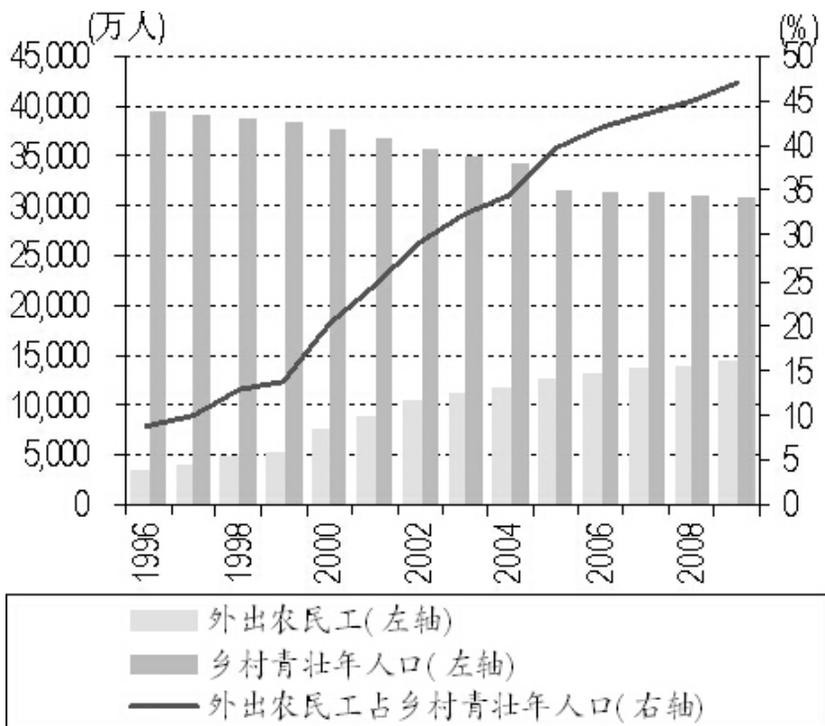


图 4：中国农民工情况

我们知道，中国过去是二元经济，二元经济意味着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几乎是 0，而城里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吸引农民到城里来打工。中国的大规模流动发生在 1993 年，农民开始异地打工。由于农民如此之众多，于是大家竞争非常激烈，工资水平可以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不涨，那时候沿海打工的农民增长收入要靠加班。但是现在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劳动力的这么一个变化，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工资上升。大家看图（图 5），在过去几年间部分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有大幅上升，平均都上升 10% 几。但是我这

里想强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存在东中西的差异。如果说有东中西部的差异，那是倒过来的，中西部的工资上涨幅度远远高于东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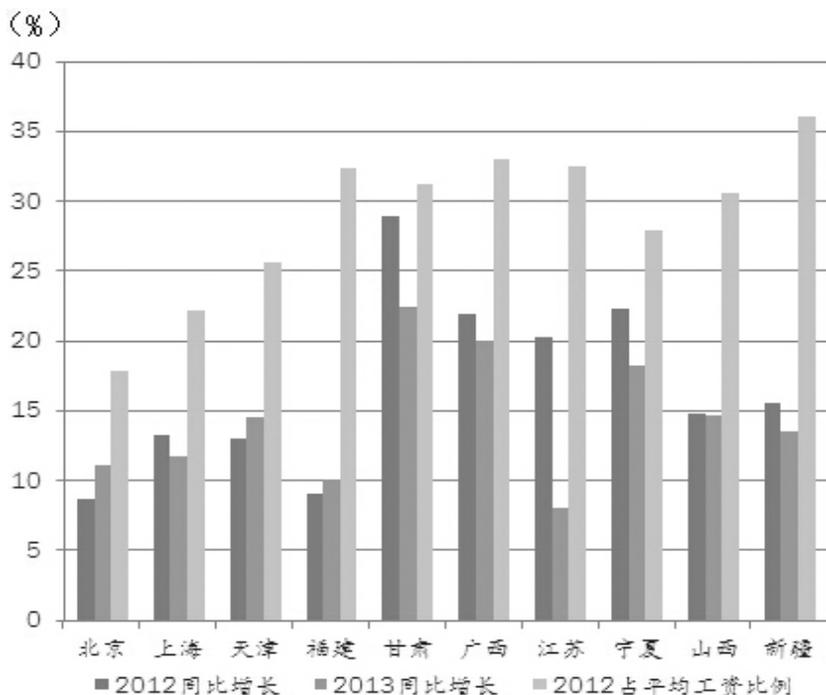


图 5：部分省份最低工资标准

请大家注意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大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幅度。去年上升最快的是新疆 35%。为什么呢？意味着中国的低成本制造业不大会出现从沿海向内地的转移。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到越南，转移到柬埔寨，转移到海外。这是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原因。这也是非洲现在变得很热的一个原因。大家也看到，因为越南这次的骚乱，突然

发现中国企业那么多在越南。由于这样一个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出口竞争优势、制造业低成本竞争优势就受到伤害。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不能再靠廉价劳动力投入，要靠技术进步。我们做研究发现，中国所有的部门，包括大家认为高科技的通信设备、计算机、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品，都高度依赖于低成本的劳动力。图6列了三张表格，假定工资成本变化，三种假定情况：一个是工资上涨10%，社会保障不变；一个是社会保障增长5%，其他不变；第三个可能发生的情况，工资上涨10%，社会保障增长5%。你会发现，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企业的利润率和利润量，都大幅下降，包括所有行业。这就意味着，对中国来说，技术进步就变得非常重要，不是某一个部门的技术进步，而是所有的行业技术进步，已经是最基本的了。这个条件和过去35年相比是重大变化。

相比基准情况变化	假定人均工资上涨10%，其他不变		假定社会保障费率提高5个百分点，其他不变		假定人均工资上涨10%，社会保障费率提高5个百分点，其他不变	
	利润率下降(百分点)	利润下降(%)	利润率下降(百分点)	利润下降(%)	利润率下降(百分点)	利润下降(%)
食品业	0.9	(8.8)	(8.2)	(3.8)	(8.7)	(12.8)
饮料食品加工业	0.9	(4.8)	(1)	(2.1)	(0.4)	(7.1)
食品制造业	0.9	(6.3)	(2.2)	(2.7)	(0.7)	(9.3)
纺织	0.6	(12.2)	(3.3)	(5.3)	(3.9)	(18.0)
纺织服装、鞋、帽	(1.9)	(17.6)	(0.4)	(7.7)	(1.5)	(25.0)
皮革、毛皮、羽毛(绒)	0.9	(14.5)	(0.4)	(6.3)	(1.4)	(21.5)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草	0.5	(7.4)	(0.2)	(3.2)	(0.7)	(10.9)
家具	0.7	(13.7)	(0.3)	(6.0)	(1.1)	(20.3)
橡胶及塑料制品	0.4	(7.8)	(0.2)	(3.4)	(0.7)	(11.5)
印刷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0.5	(10.0)	(0.4)	(4.3)	(1.2)	(14.7)
文教体育用品	(1.1)	(26.6)	(0.5)	(11.6)	(1.6)	(39.4)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	0.2	(56.0)	(0.1)	(24.4)	(0.3)	(82.3)
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	0.4	(6.6)	(0.2)	(2.9)	(0.6)	(9.8)
医药	0.5	(4.9)	(0.2)	(2.1)	(0.8)	(7.2)
化学纤维	0.3	(5.1)	(0.1)	(2.2)	(0.5)	(7.6)
橡胶制品	0.6	(8.8)	(0.2)	(3.8)	(0.8)	(13.0)
塑料制品	0.6	(9.8)	(0.3)	(4.3)	(0.9)	(14.6)
非金属材料制品	0.5	(6.2)	(0.2)	(2.7)	(0.7)	(9.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0.3	(15.1)	(0.1)	(6.6)	(0.5)	(22.3)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0.3	(8.8)	(0.1)	(3.8)	(0.4)	(12.9)
金属制品	0.6	(10.2)	(0.2)	(4.4)	(0.8)	(15.0)
通用设备	0.6	(8.9)	(0.3)	(3.9)	(0.9)	(13.2)
专用设备	0.6	(8.4)	(0.3)	(3.7)	(0.9)	(12.4)
交通运输设备	0.5	(6.3)	(0.2)	(2.7)	(0.7)	(9.3)
电气机械及器材	0.5	(7.4)	(0.2)	(3.2)	(0.8)	(11.0)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0.6	(15.9)	(0.2)	(6.9)	(0.8)	(22.5)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	0.7	(10.3)	(0.3)	(4.5)	(1.1)	(15.2)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	0.7	(13.0)	(0.3)	(5.6)	(1.1)	(18.2)

图6：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盈利影响

第三，是人口的变化。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我研究中国宏观经济 30 多年，但是我想说，唯一没有估计足的，是中国人口的变化。到现在我也想强调，我不能全然理解它的影响，它究竟意味着什么，真的不能完全充分理解。

我想讲几点。大家知道，在人口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叫总合生育率，说直白一点，就是一个妇女一辈子生孩子的胎数。妇女生孩子的胎数，决定人口的结构。通常认为，总合生育率如果等于 2.1 的话，人口是不会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是平的，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基本比例是一致的。如果生育率超过 2.1，那么人口会变得越来越年轻，社会年轻人会增加，社会会年轻化，越南和印度都是这样。当然，如果总合生育率低于 2.1，人口一定会老龄化。我们 30 年之前就知道，中国人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会使中国人口会老龄化，政策就定了 30 年。但是我们那时候认为，总合生育率基本在 1.8 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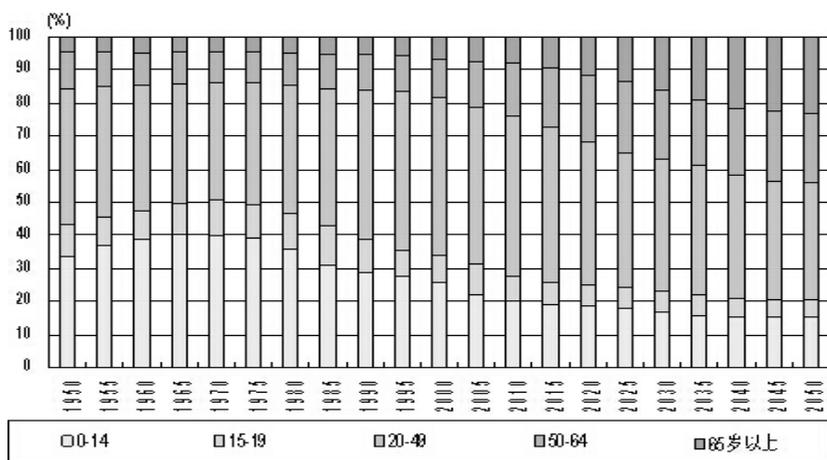


图 7：中国人口年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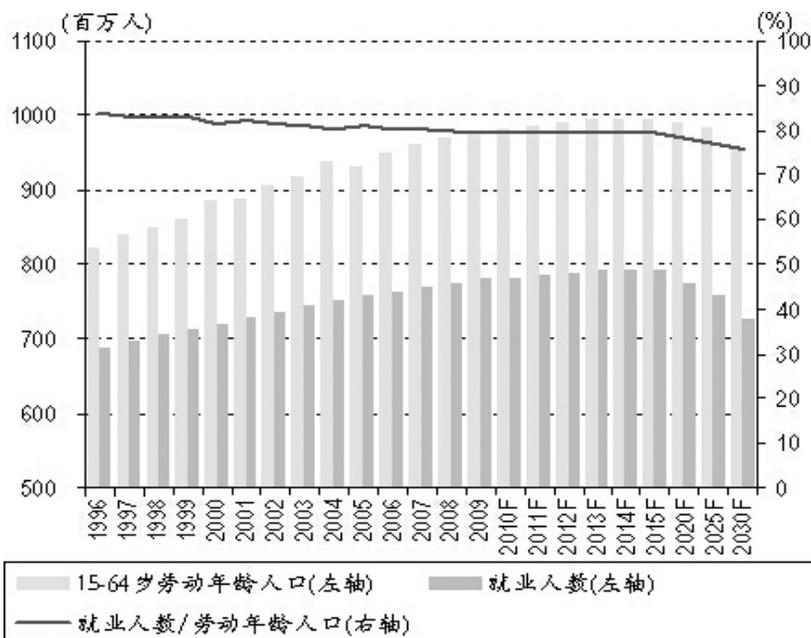


图 8：劳动年龄人口

我想强调的是，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总合生育率非常之低。按照我的算法是 1.4 ~ 1.5，我看过最低的是 1.13。总的生育率变低，到了 1.4 ~ 1.5 和 1.8 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能全然理解它的变化，但有三点看的很清楚的。第一，关于人口总量，如果是 1.8，中国的人口高峰大概在 16 亿，会发生在 2035 年左右；如果是 1.4 ~ 1.5，高峰在 14 亿，10 年以后人口就绝对下降。第二，如果是 1.8，中国人口老龄化会发生在 2020 年以后，所谓老龄化就是 64 岁以上的人口超过 10%；如果是 1.4 ~ 1.5，现在就是了，64 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 10%，按去年统计的数字是 9.7%。如果中国维持现在的统计标准，就是 60 岁的话，

已经达到 14% 点几。如果维持统计标准不变，2020 年，60 岁以上人口占整个人口比例的 20%。这就是为什么退休问题、养老问题，被吵的如此热闹的原因之一。第三，如果是 1.8，中国人口目前还是没有老龄化，就业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是 1.4，那么就业压力就不是很大的问题。我们过去按这个推算，说大概在今年或者明年出现拐点，人口开始下降，市场劳动力下降。但是从统计数字来看，2012 年就出现了，当年下降 0.6 个百分点，345 万人，去年也在下降。换言之，比我们推算的数字提前两年，那就意味着，很可能总合生育率不是 1.4 ~ 1.5，比这个数还低。由于劳动力下降，就业压力就缓解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从好消息上来讲，由于人口变化，消费变得有希望了。尤其老年人的一些消费是必须的，比如说医疗、养老，都会变成热门产品，会很兴旺，你看所有的保险公司都在推销养老房地产。坏消息是老龄化，一个社会吃饭的人多了，干活的人少了，人口红利开始消失了。它主要表现为储蓄率下降，而储蓄是投资的来源，投资驱动经济难以持续。其实中国出现的债务问题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仔细观察银行，你会发现在过去几年中，银行的存款增长速度在持续下降。当然，人们说这只是居民行为的改变，觉得存钱不合算，买房子更合算，这个我不否认。但是，是不是储蓄率也在发生变化？因为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花钱的多了，吃饭的多了，干活的少了。未来靠投资推动经济将遇到很大的困难，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表现是资金成本会上升。这跟过去 35 年相比也是重大的变化，你突然发现，过去中国经济增长靠投资推动的，现在投资的动力在减弱。

第四，现在节能减排成为大势所趋，资源的不可持续性

日益显现。看看北京的雾霾，现在这个雾霾已经不是北京的雾霾，而是全国的雾霾，曾经最大面积达到 249 万平方公里，连成一片了，从北京到上海。环境问题就是不可持续。过去的经济增长，认为环境不要钱的，资源是低成本的，劳动力成本又低，中国把土地又廉价批租一下，而现在都变成约束了。前两天，又开始一次热吵，因为中国去年农村工作会议有重大变化，中国的粮食现在不完全自给。换一句话说，能保证你吃饱，但不能保证你吃好，口粮是 95% 自给，但其他农产品基本是放在国际贸易基础上。国际上开始说话了，说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增长，中国人买世界农产品，也变成了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汽车工业增长很快，20 年前中国石油是出口，现在是进口，限制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超过 6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源、能源、环境的约束，使得以前靠廉价资源、廉价能源以及资源耗费型、环境污染型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上述所有因素的变化，就是一点，中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开始下行，开始往下走。如果按这样算，我们会看到经济增长是从两位数向 6% 的方向走。那么你可以理解，宏观经济调控就在 10% 和 6% 这个中间，多高多低，调控的核心就是投资和出口。

中国经济正在告别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从积极意义上讲，中国高速增长维持了 30 多年，过去韩国、日本也不过就 20 年左右，而且中国是 13 亿人口的大国，所以这也是值得骄傲的。目前中国增长阶段就类似于出口导向型国家，比如亚洲的日本 1973 年以后、韩国 1998 年以后，都是告别了两位数经济增长，都出现我们这种担忧。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下，又不一样。当时的韩国，当时的日本，城镇化率高达 70% 左右，而中国去年大概就 53% 左右，其中又只有

35%是城市户籍人口，其他还是非户籍人口。理论上，在城市化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是有潜力的。但是，现实的表现似乎又不象，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制度设计得不对，没有形成城市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阶层。我们知道，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有文化问题、生态问题。所以深化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改革，你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位一体，也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如果说这还不够，再加两个，一个是党的建设，一个是国防。希望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支持一个城市化的经济体制，导致经济结构的转变，从而使中国经济可持续。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宏观经济怎么安排或许更有利。大家看到宏观经济政策的立足点正在发生变化，新一届政府考虑的问题与上一届政府有所区别，新一届政府认识到，中国经济正在告别两位数增长，下了一个台阶，但核心问题就是在新的台阶上是否能站住。基本的立足点是认为短期经济波动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有秩序的稳增长，这就需要结构调整。于是，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要短期长期相结合，这也被西方国家命名为李克强经济学。从长期来看，要提高这两个效益，增加就业收入，要科技创新技术进步，要加大资源环境保护。从短期来说，宏观增长要有一个合理区间，有一个预期调节，有一个警戒线，上限就是防通胀，下限就是稳增长，底线就是稳定，上限与下限的中间来做一个短期宏观调控。调控的目的是为这样一个升级版创造条件。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说了，上限是通货膨胀不超过5%，下限是什么？经济增长7.5%左右。底线什么，新增就业1

千万，然后城镇失业率 4.6%，这是底线。如果经济不滑出这个下线，就不用理。重点是要调结构，调结构怎么做？通过改革。如果经济滑出底线，再托一下，托回去。这和过去的政策有重大变化，过去咱们靠政府的刺激拉动经济增长，过去是拉，现在是托。今年是这么一个宏观经济政策，GDP 增长 7.5% 左右，CPI 增长 3.5% 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 4.6% 以内，城镇就业增加 1 千万以上。你会发现，这个政策组合是有意义的，有变化的，有道理的。怎么说？三句话，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如果从这里理解，现在稳增长是第一位的，最近媒体的变化，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变化，都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可是你知道，在今年年初，或者去年说什么？促改革、调结构，稳增长。去年以后加了一条，惠民生。从稳增长来说，我们预计，中国投资还会进一步下行，一旦投资下行，政府就会投资。但是投资思路和做法发生了变化，投资不再是促增长而是稳增长，投资主要是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承担，投资不再偏重于制造业而注重于长远发展能力建设。最重要的是两个，保障房和铁路，铁路投资量最大，大概会超过 8 千亿达到 9 千亿美元左右，开工项目由 46 个增加到 64 个，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投资。前些天在国务会议上，马凯同志专门主持铁路促进投资的会议，布置各种任务，促进铁路投资。在铁路方面会有重大的变化，比如说，铁路建设基金，还有铁路附属的土地会拿出来的，千方百计增加铁路投资。

底线是防范金融风险。现在通常认为，中国金融风险第一是地方债务，第二是影子银行，两者高度相关。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地方债务有三个，第一，政府直接债务；第二，政府或有债务；第三个，具有某种救助义务的债务。我

们说，主要是政府的或有债务和直接债务。观察这个债务，期限错配的问题很严重。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债务和西方债务不一样，有很多实物资产。最明显的就是铁路，铁路的负债率非常高，但是铁路建设要好多年，而银行贷款只有两三年，两三年后路还没有修好就要还钱了，当然还不出来。

研究一下地方债务，从改革思路上来讲，是这么解决的。第一，通过严肃财政纪律，主要是通过财政体制改革，重新确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我们预计这个在明年会展开，今年考虑政府债务的问题，所以这项改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了，但是今年还没有展开。然后增加收入，包括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在这个基础上其他的就简单了，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把地方融资平台剥离出政府债务，然后看地方融资平台能不能企业化，其项目融资能不能项目化。请注意财政部正在努力推这件事，就是 PPP 安排，预计下个月，在哈尔滨和洛阳，就把政府项目拿出来招标。中央政府定了 80 个项目，如果哈尔滨和洛阳能实验成功，很可能这个经验会推广到全国，然后公共和民营合作的安排，逐渐使这种投资变成企业化，变成项目，然后以项目收入作为质押去融资。在这个基础上，第三，真正的政府债务，就真正由政府财政承担，让地方政府自办发行，那就需要地方政府有资产负债表。作为财政部门的顾问，去年我们就开始编制中国各级政府负债表，上海是一个试点。上海财政局、北京财政局大概今年就会有样子了，如果变成标准模板，全国各地政府都按照这个来编，这为将来政府筹措债务奠定一个最终的条件，会有依据，会有评级。

第二，就是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其实也很简单，所谓影子银行，就是不受监管的业务，那就让它受监管就是了。监

管不就两种方式吗？一种就是非标准资产进入资产负债表，这是银监部的监管方式，叫资产负债比监管。另一种就是证监部的监管方式，大家都知道，就是信息披露、风险自担，这需要资产证券化。似乎在中国来说，头一件事办的比较容易，第二件事办的比较困难，但是第二件事资产证券化更重要。这就是前一些日子资本市场又成为国家政策关注重点的原因之一。资本市场发展很重要，请大家注意，中国的负债率非常高，降低负债率一个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增加资本。如果资本市场不能发挥再融资功能，这个负债率很难降下来，这个去杠杆过程是很困难的。资产证券化顶多能对债务期限做一个安排，使之长期化，但是它对负债率的降低意义并不是很大，但它也是资本市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展期限，一个是降负债率。如果债务有这些化解路子，宏观调控能够争取时间，使债务重组，使这些东西能够进行下去。好比在一筐苹果中间，把好苹果挑出来，那你得有个时间，宏观调控就是在创造时间。对很多地方来说，就是利用这个时间，进行债务的重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方面推行公共民营合作，利用民间资金进行债务的重新安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创造环境，通过这些争取时间，为经济可持续性打下基础。

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吗？关注四个指标，我们说，中国经济已经在发生积极变化。哪几个积极变化？第一，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结构中间，服务业从去年开始第一次超过工业，占 GDP 最大的比重。过去中国经济结构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服务业增加比重低，十一五计划没有完成，现在开始变了。服务业在发展，而服务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正在积极变化。这个服务业是真正的服务业，而不是一般的

服务业，将来的医疗、养老、教育，金融是最重要的，还有和生产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

第二，就是中国居民收入在持续提高。在过去几年中间，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是两位数。和农民相关的业务变成新的增长点。比如说，我所服务的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去年超过我们。农业银行为什么超过我们？很简单，农业银行的网点都在农村，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把钱存在农业银行，农业银行低成本资金增加很快，农业银行迅速做大。

第三，技术进步在加速，中国去年第一次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超过2%。我想说，这个超过2%不是由政府来提供的，是由市场提供的。中国是去年专利增加最快的国家，中国的专利拥有数去年是全球第二。远的不说，比如汽车工业，中国汽车工业是技术进步最典型的，现在新车发布跟全球同步，车价在不断降低。最重要的是汽车工业大规模使用机器人。技术进步开始变成一个动力，这是最积极的变化。

第四，中国的区域差距也在发生变化。在过去几年中间，中西部的增长速度快于东部，即使从今年一季度看，增长最快的依然是在西部。这个区域差距变小是什么？你会发现消费在扩大，其中消费弹性比较高的类似奢侈品这样的东西，西部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因为它收入在增长。

宏观调控是什么？是创造适宜的环境、温度，然后促使嫩芽长大。什么是改革？改革是固本强基，施肥浇水，一旦嫩芽长成参天大树，中国经济自然可持续。尽管这个持续并不回到过去两位数，但是会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变成一个可持续、可维持的过程。从这个方面来看，希望是存在的。但是曙光前面，总是有黎明前的黑暗。我们认为，未来两年是

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它的困难性不仅仅在于经济下行，最重要的是各式各样的风险都在爆发，尤其是债务风险，这对各级政府都是重大的考验。如果能平稳度过这个环节，未来是光明的。但是眼下如何度过是最关键的。以上就是今天要讲的，谢谢大家。

提问与讨论

乔依德：大概在一个小时当中，曹远征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采的演讲。他的条理很清楚，虽然我们自己也对中国经济也很关注，但是他讲的很多事情，讲的比较细比较深。下面就是我们的提问时间，看看谁有什么问题，我们抓紧时间提。

王世豪：感谢非常您的精采演讲，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从会计学的角度说，三张报表，第一张报表是资产负债表，确实负债高；第二张报表利润表，利润虽然低一点，但是利润还是大大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第三张表现现金流量表，就是负债问题。我想问，不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增加资本金也好，债转股也好，中短期的转长期的也好，最后的出路都在资本市场。但是现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处于 25 年来最低点，持仓数低于 30% 是历史最低，交易户数低于 1 千万是历史最低，平均市盈率低于 3%。现金流量的出路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 35 年来能够这么快发展，是因为有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今年，国际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苏联解体之后，23 年来两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发生改变。第一个十年，中国依靠美国，因为美国要利用中国打击苏

联，给了中国援助。第二个十年，美国观察中国是否是韬光用晦，又争取一个十年。第三个十年，是因为WTO，因为911。还有一个五年是因为金融危机。一共给了中国35年机遇。但是正在变化，一体化正在中断，好像冷战又在开始，美国重返亚太。这个对于中国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谢谢。

曹远征：很好的两个问题，很困难。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没有解。似乎什么政策都使过了，最后发现就是这样。我们甚至建议过很极端的措施：所有现金全部分红，然后放开融资。似乎改来改去，改了半天，股市就是不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有各式各样的建议，但是似乎现在真有点黔驴技穷之感。其实王行长说得很重要，其实只有靠这个，才能维持，否则的话靠银行是干不下去的。但是它就是不好。证监会说，好吧，中国市场不好，海外融资现在大开绿灯，你要能搞到钱，你就到海外去吧。前两天，京东在纳斯达克上市，中国好几个全部到海外去了。

第二个，我们注意到今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以乌克兰事件为代表，乌克兰事件如果从立场来讲，很有可能重回冷战。乌克兰原先是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缓冲地带，不管由于什么原因，现在乌克兰分裂了，使俄罗斯直接面对北约。过去所谓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和北约的蜜月期似乎彻底结束，国际媒体就这样评论的，担心会不会重开冷战。我们认为不会走到冷战，但是冷和平是一定的。这个时候中国最大的问题，就开始选边站了，你和谁站在一块去。目前的态势大家也很清楚，和俄罗斯站在一块了。那就意味着中国的南部环境就变得非常的复杂。越南现在天天拉着美国人，

其实在三十几年前，越南人和美国干了一仗，现在没有问题了。一个新的态势，新的国际环境，新的国际格局在形成。坦率的说，中国过去那种机会主义的国际战略，可能将来不行了，你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你想干什么。以前的战略是韬光养晦，这本是机会主义的，现在你想韬光养晦，你想机会主义都机会主义不了了。这可能是个重大问题。我们现在不知道国际局势会怎么变，但我们看到韬光用晦很难坚持。

谢荣兴：谢谢曹远征的演讲。我问一个地方债务的问题。现在地方债务那么重，而且现在又公开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我以前搞过分红，地方政府不能担保的，担保是违规的。中国地方政府是绝对不可能不兑付的。这样下去的话，地方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曹远征：地方债实际上很简单，从逻辑上讲，是以未来财政收入来担保的债务。这个不应该视同为地方融资平台的公司债，这两个要分开的。地方财政收入是什么收入呢？主要来自于它的正常收入，包括税收，也包括其他收入，然后用此来还债。这个债主要用于民生的，不应该用于建设性投资。而地方融资平台，应该变成企业，变成项目，他以自己的项目收入作为质押发的债。我们觉得这个区分非常的重要。其实这次十个省市自办发行，用财政收入做担保。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事权划不清楚，又会导致乱花钱。从利益上来说，能不能把地方融资平台的这个债务先从政府债务中剥离出去，这是最核心的。

比如说，自来水，我能把自来水剥出去吗？可以的，你允许他涨点价，自来水就有收入，他就用项目来做了，不再跟政府财政有关系了。比如地铁，我们就给北京市地铁建议，北京市政府的财政，每年补助公共交通差不多 200 亿，

全世界最便宜的地铁，两块钱一张票。那你能不能改成上海的这种售票方式？这技术上也可以做到，至少可以缓解财政压力。如果你要用香港的方式，用 PPP 做的话，其实效果更好。我们研究过北京地铁，北京地铁 4 号线是跟香港合资的，是 PPP 的安排，北京市政府投资洞体，香港投资轨道运营。尽管票价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安排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到北京坐四号线，你发现它的营运最好，至少广告很多，花花绿绿，因为那个收入是和香港的地铁连在一起的。其它的地铁，你看 10 号线，乱七八糟的。这个事情做一下，至少是可以缓解很多问题，不敢说把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但是能缓解，这个叫商业化的运营。至少可以把好的苹果挑出来，不要让好苹果和烂苹果一块烂掉。

夏善晨：你讲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们在实际当中，常常会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跟他有一样的问题，对于地方政府的担保，这个债的承受力，最后是不是兜底？刚才你讲的，我觉得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从我国法律来讲，地方政府用税收做保证，其实应该是无效的，因为法律明确政府担保无效。第二个问题，我现在看到的，你在说的 PPP 问题，现在中国民营资金或者说来自民间的资金，对于这种项目，是不是还有这么大的热情？从我在美国观察到的情况，大家都在讨论中国下一个经济走向，更多人问我一个问题，说你是搞金融又搞法律，你看看我们是把钱留在中国还是国外？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要说真心话，中国现有的投资收益，不如在国外稳定和增长的预期好。他们担心这个钱在中国的各种风险。经济的预期好象也不理想，你刚才也说这两年比较困难。我同意许小年教授的一些看法，经济是不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叫他坚持抗战，还是叫他按照资本的

规律去走？谢谢。

曹远征：我想讲个故事来回答你。16年前，我离开国家体改委到中银去，遇到第一件事，就是广国投破产，当时王岐山是广东省常务副省长，中银是最大的债权人之一。香港人撺掇我们作代表去跟广东省政府谈判，说为什么要这样？广东政府说的很清楚：我只能重组，你要么接受重组，要钱没有。你说的很对，地方政府的债务一定存在着风险。但是我同样跟你说，广东政府选择了广国投破产，他用重组的方法来解决。在中国是选择性的，也就是对你的问题的回答是，YESANDNO。不能叫他成为系统性的区域性的金融风险，但是它一定会有违约出现。这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但是中国现在处理问题的复杂在哪里呢？你会看到，2779个县，只有54个县不负债，你不知道哪里会出事。这个是你事先防范也防范不住的，只能事后加以解决，就是叫风险不传递。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PPP能不能做成，能做成，而且赚头很大。你看看深圳10年前的景象，深圳水务、深圳燃气和深圳公交，现在深圳燃气已经上市了，都是从国有中间开始做PPP安排，然后换成民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观察，最早中国电力所有的发电的钱，都是BOT安排。中国所有的自来水厂，大概有4百个，都是BOT安排，而且都有稳定回报。这是一个安排，是一个法律架构问题，是一个可持续性问题，中国政府也认识到这点，我本人也作为顾问或者委员参与。特许经营法，有一个长期的预期，短期是不行的，现在正在起草，而且列入立法。长期赚钱，短期赚钱不赚钱？我告诉你一个例子，90年代国有企业破产，他怎么弄？他怎么做，最极端的例子，你把工人工资发了，社会保障交了，

银行贷款还了，剩下全送给你。上海二纺机等等，都是这么做的。很多民营企业就这么转的，厂长经理承包了以后，这叫承债式收购。因为你会发现，中国很多的东西，一般有 20% 或者 30% 的资本，那是打折的空间，可以作为你重组的安排。而且你知道，中国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债务问题和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中国不是金融上的问题，是有资产质押的，是有实物资产的，美国呢，你看到所谓的 CDU、CDS，是跟金融资产联在一起。我们是实物资产质押，有真实的资产，只不过是在现金流上、在其他方面有困难，那么你可以做一个重组安排，是可以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短期的回报和长期的回报，我个人认为都看好。当然从更短期来讲，可以这么说，目前的中国的利润水平是全球最高了。投资中国市场，应该是最核算。即使我们说中国股市不行啊，但是我告诉你，你买中国银行股票，可以当作固定收入，每年分红率几乎是 6% 到 7%，如果股票涨了，你还有意外之喜。

赵大东：你刚才谈到的三中全会的 60 条。前两天，在政治局学习会议上，网上大家也注意到一些新的东西。一个是总书记自己在说，党要在市场经济运行中起领导作用，说这个话好像是第一次。另外一个，他就着重谈到两只手，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意思好像是希望看得见的手要出来。这个我想听听你的解读。

曹远征：我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如果按党的文件来说，是这么说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市场起决定作用，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第三条。第五条和第十几条全部都讲市场应该怎么做。既然是坚持共产党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最重要的，这是全党决议。

乔依德：你说的第一条，我也没有注意。但是第二条讲的，三中全会也有，讲到政府也是要发挥作用，只不过没有讲得那么形象，无形的手，有形的手。我们最后一个提问。

于卫国：我想请教一下，最近人民币贬值是什么道理？是央行的干预，还是市场自发的行为？

曹远征：目前人民币贬值，我们认为不是人民币实际贬值，而是相对价格的变化。理由在这么几点。第一点，你发现人民币在过去几年的表现分三个阶段。2012年9月份以前，人民币兑美元是贬值的；2012年9月份以后到今年年初，人民币兑美元是升值的，随后又是贬值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看，它跟美元的变化是相关的，在2012年9月份以前，由于欧债危机，美元是避险资产，美元开始升值。9月份以后，美国QE3，美元供应充足，美元开始贬值。今年美国说要退出QE，美元开始升值。这是人民币相对价格变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证据，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兑美元单向的变化。可以解释为，人民币可能本身是稳定的，是有升值的，但是美元目前升值比人民币升值更快，所以人民币兑美元属于相对贬值。

这个相对贬值是央行乐见其成的。央行趁势把它上下浮动的幅度扩大到2%。扩大到2%是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在未来两到三年中间，人民币可以实现基本可兑换。人民币汇率一定是在全面可兑换的基础上，资金流动性才实现均衡汇率，现在的2%是在寻找那个变动点，现在的汇率并不是真正的均衡汇率。第二，到目前为止，中国去年、前年，包括今年，贸易的顺差变化，说穿了，是套汇套利。在日本市场，在美国市场上，利率几乎是0，只要是我把它搞到中

国来，变成人民币，存到中国银行有 3.5% 的利率，如果人民币还每年在升值 3% 甚至 5% 到 6% 的无风险利率，套利是稳扎稳打的。人民币的汇率，上下 2% 浮动，这 2% 的浮动，是 1 毛 2 分钱，套利可能还存在，套汇就变得困难了。尽管现在国外，尤其美国欧洲经济在变好，中国出口增长并不是很明显。放宽 2% 的浮动，可以打掉虚假贸易。未来怎么样？人民币从长期来看，依然有升值倾向，我们说人民币每年升 3% 到 5%。为什么？是基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每年 4% 左右。到目前为止，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在减缓，但是毕竟在提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你做资产配置，目前更多取决于美元的变化，我们认为是这样：如果在今年内，人民币名义贬值不超过 3%，持有人民币是划算的，因为人民币一年期的利率是 3.5%。

丁昕容：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中国有个传统，叫一放就乱，一放就死。在制度设计上，可能存在一些先天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现在都在讨论国退民进、混合所有制的问题，您持什么观点？我们的未来会不会像日韩那样的大商社、大财团的方式？谢谢。

曹远征：关于中国企业总的形式，我以前在体改委工作，我们天天讲企业改革，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日本的商社，然后是公司制、企业集团、股份合作制、股份制，这些都讨论。但是我想说，可能中国企业有自己的逻辑，现在走的基本上就是公司制，而且还是股份公司。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是股份公司。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混合所有制，只不过它的问题是国有股一股独大，占的股份太大。那么国有股份能不能通过减持，使公司的治理结构会变得更好一点？如果说过去条件还不成熟，现在的条件越来越

成熟了。最核心的，就是社会保障越来越好。

我们看到，目前中国政府应该说是全世界是最有钱的政府，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它的预算是不通的。中国政府四个预算，第一个是一般性财政预算，和税收相关；第二个是政府基金预算，是税外收入，主要是卖地的收入；第三个是国有资本预算；第四个是社保预算。现在社保有缺口，但是中国政府还拥有很多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接下来的逻辑就是国有资产能不能转社保？在这个过程中，从2003年的时开始，只要国有企业上市，10%的股份转社保，这个比例将扩大，社保将变成国有资产最重要的持有股东。社保天天要支付，社保又管不了企业，就委托基金操作。基金呢，又是财务委托人，要为社保赚钱，说你经理要好好干，不好好干就滚蛋，治理结构会由此得到改善。如果讲混合所有制，目前混合所有制唯一还没有做的，就是职工持股。其他形式都有了，就是职工持股。职工持股究竟好还是不好？我不敢评价，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过去职工持股最大的问题就是短期行为，因为他不能真的成为股东，然后他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会追求企业的长远利益。我不敢评价好不好。但是有好处，它会增加资本。其实我们现在发现，民营企业开始往这个方向走的更多了，像万科最近的事业合伙人制，找了1000多人，开始持有万科股份。很可能职工持股在治理结构，在激励机制上，可能有所不同。我们说，混合所有制，在某种意义上，不仅仅在国有企业，很有可能在像万科这样的企业，万科自称是一个民营企业，发生一些变化。其实马云当年说的合伙人制，不也就是这个意思吗？谢谢。

乔依德：由于时间的关系，我知道有些人还有一些问



题，我们也只能到此结束，最后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曹远征的精采演讲以及刚才的对话，表示感谢。今天的沙龙到此结束。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大一统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

马德斌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上海新锦江大酒店 2014年7月4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卓越发展研究院院长）：各位来宾，我们沙龙的演讲就要开始了。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马教授也是上海人，他在上海大学毕业，然后到美国留学，在德克萨斯的大学获得了硕士，然后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现在他从事的专业是经济史，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大一统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马教授给我们演讲。

马德斌：非常谢谢乔先生的邀请。非常高兴有机会给大家做这个交流，因为我们做学问的很少有机会和真正做事的人交流，我们做的事可能一般人也不是很感兴趣，所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刚才乔先生已经介绍过一点，我从小是在上海长大的，所以也在上海财经大学也兼职。我1989年去的美国，博士读完以后去日本读博士后，然后去了伦敦，因为那里专门有一个经济史系。我在伦敦差不多呆了9年，3年前跟乔先生在一个国际经济学会议上见面认识。

“大一统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这个题目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我记得刚做的时候，在美国开学术会议，那时候一般这种会只给你20分钟时间，我就说20分钟

讲 2000 年的历史，等于一分钟讲 100 年历史。而且大家也知道，一般做欧洲史的西方专家对中国历史不熟悉。这个题目我的 PPT 全部是英语的，所以也是抱歉，PPT 非常多，不可能讲完，但是我把重要的内容讲完，然后听听大家的反馈意见和各方面的问题。

我最早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感受比较深，因为是在海外做中国的长期历史发展研究，又因为中西差别，这个感受就更深了。西方有很多的框架来了解西方的经济史。但你从中国的角度去考虑，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西方一个比较有名的说法，“War makes states, States make war”，就是“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但是这不一定完全是坏的事情，有时候它有正面的东西，就是说战争导致一个共同的外来威胁，所以对国家的凝聚就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带动了国家制度的建设，因为以前你没有必要去建设一个国家。这带来了很多方面的进步，特别是它的财政能力，国家开始要收税，税收就开始变得非常重要。其次就是它的金融能力。比如说，英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直接跟国家制度的建设有关系，特别是公债的发行有相当直接的关系的。比较有名的就是得诺贝尔奖的诺斯，大家可能有些人听说过，他在 1989 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论述为什么战争造成国家力量的凝聚以后，会带来财政和金融能力的提高。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战争的时候国家需要财政，需要收税，因为要养军队，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时候皇帝就必须跟地方上的精英讨价还价，当时的地方精英我们现在叫国会，就是议会，这个时候皇帝就必须向议会让步，议会在某种情况下就夺取了很大的权利，这也是后来形成的一个所谓宪政的来源，特别是议会的权利凌驾于皇帝

之上以后。议会特别代表地方势力，地方的土地拥有者和商人的势力，后来收税能力大大提高，经营能力大大提高。英国的工业革命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但是工业革命之前的100年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光荣革命。美国人特别喜欢光荣革命，从某个角度说，光荣革命是宪政的开始，光荣革命使议会取得了巨大的权利。议会开始以后，特别是后来英格兰银行起来，整个英国的国家能力大大提升，所以是由这么一个顺序过来的，这是由战争导致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国好像不缺少战争，中国有很多农民起义，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中国的战争最后导致的途径不完全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描写的西方的经历也许不一定适合中国。也许他们认为他们的经历是普世的，但实际上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理解中国历史对我们重新了解现代国家的产生以及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带来重要的意义，这是我研究的一个出发点。

西方往往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你准备打仗，另外一个国家也这样，你现在找到一个新的征税办法，找到一个新的收取资源的办法，其他国家也开始马上模仿。光荣革命就是比较有名的例子，因为光荣革命把荷兰的一套方式全部引进来了。荷兰处于战争的中心，它最早是从西班牙这个帝国独立出来，后来一直跟拿破仑，跟其他地方一直在打仗，所以它对财政的要求非常大，也在这个方面很早就开始建设很多制度，特别是公债制度最早使阿姆斯特丹成为金融市场。你看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选了一个荷兰皇帝，这个牵扯到宗教改革。英国有一个新教，和原来天主教有差别，英国把荷兰的皇帝请过来了，这样的话英国和荷兰有了一个

联姻。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成为一个常态。

大家看到中国也有战争，但是中国这个战争最后没有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差别，也是最后导致了大一统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同样有战争，在欧洲产生强国与强国之间的竞争，中国也有竞争的时代，这个大家做中国历史的都知道，但是最后导致了一个中央集权一体化的一个国家？很多学者在研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就说，宋朝是最发达的，那时候很多西方国家都没有的制度，比如说最出名的就是纸币，是《马可波罗游记》里面写出来的。欧洲那个时候全部用硬金属，所以你看宋朝很早就开始发行纸币，当然这个纸币和我们现在的纸币不完全一样，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创新。但是宋朝为什么没有工业化，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或者西方兴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部分人都说西方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新教，新教之所以能够成立，也是在其他国家开始起来以后，才能够有一个新的宗教产生。法国的启蒙运动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很多科学家，地心说、日心说，很多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以后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避难。我有一次跟瑞士人聊天，瑞士的钟表做得很好，他说你不知道瑞士的钟表来源于什么。瑞士是一个很贫困的国家，瑞士那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是最糟糕的，就像我们现在的云贵高原一样，在山地中间。所以希特勒后来也没有打瑞士，没有必要打，这个地方也难打，全是山。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法国开始迫害新教徒，新教徒大部分都是手工匠人，这个手工匠人开始大批逃难，很多人逃到瑞士。当时

英国的丝业就是胡格诺派（法国新教徒）带来的，他们是因为法国迫害新教过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国与国之间竞争，有一定的活力，这个活力导致了后来也许跟大一统结果的不一样。

现在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是大一统，而在欧洲并不是这样。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大家有机会也读一下，就是《枪炮、细菌和钢铁》，里面专门有一章是讲中国。他说，你看为什么中国比较统一，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中国是东西两条河，而欧洲看不到这样一个地理上的统一的位置，所以说地理上是可以解释的。欧洲的地理是非常曲折，而且隔的很厉害，有地中海，有英吉利海峡，冒出了英格兰这样的国家。当然比较早的说法，是所谓的亚细亚专制主义，就是水利导致了官僚体系的产生等等之类。当然，我们更多的一般从文化上解释，中国皇帝权利很大。但是没有解释权利为什么这样大。

我就从这些问题开始出发，是不是有一个理论能解释大一统，跟欧洲的国家对照，然后最后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我必须说明，我主要是做经济史的，不能说对现实有多大的意义，但在某些程度上，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的资源。

地理位置确实很重要。如果你学中国历史的话，大家也知道中国原来是中原，可能大家听说过陈寅恪这个历史学家，他那时候写了一篇很有名的叫《关中本位》。谁占据了关中，谁就能够控制中国，因为这个关中就是西安那一带，那是块平地，那个平地四面的地势非常险要，它是易守难攻。后来进入中原，中原就是在洛阳开封这块，所以你就看北方两大平原起了很大作用，地理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不完全是地理的原因。比如说长城，长城是人造

的，长城给中国的大一统带来很大的影响，但这是一个人造的体系。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大运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地理也不完全，从经济学来说这是一个内生的，是后人建的，不是一个自然的东西。

我们在做报告的时候，有一个欧洲学者说，《三国演义》第一句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为什么不用这句话做开头。我说对，中国确实不是一直都是统一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们现在注意到欧洲的分裂，但是你要去看全球的话，分裂的地方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分裂的地方都产生这种动力。比如说东南亚一直是很分裂的，中东也是很分裂的，所以分裂不一定会带来这种动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现在可以比较快的来谈一下中国统一与分裂的历史，大家要有兴趣的话，复旦大学历史系葛剑雄，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他写了一本书《统一与分裂——中国的历史的启示》，很多地方我是照他的东西，做一些数量化，来强调一下。

我在西方做报告的时候可能这个会多讲一点，在这里就不用讲了，中国的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的，就是战争导致国家的产生。中国的战国时期，战国之前有春秋战国什么的，水利不是很重要，确实是战争，因为战争需要调动资源，调动资源以后就开始形成这个国家。我们知道的法家就是建设国家机器的一个最强大的力量。兵马俑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战争的规模开始扩大。以前欧洲中世纪的时候，打仗都是贵族的事情，以前打仗都是很贵的，都是骑着马匹，坐着马车，穿着盔甲，后面有仆人帮你抬着东西，就像骑士决斗，是这样的战争。到了后来，因为以前有很多东西也用马，到了后来的战国时代，你看秦始皇的战争，

特别是像商鞅变革以后，他就开始大量用步兵，步兵战争就把整个把战争的规模改变了。后来就是所谓秦始皇的“兵农合一”，整个一套农村的制度，就是大家说的保甲，这个制度全是从军队的制度转过去的。因为秦始皇也喜欢农民，因为农民有铁锄，这个东西马上就可以转成武器，可以打仗。还有一个，农民你给他土地，所以土地的私有产权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给他土地以后，他就会扎根在这儿，跑不了。然后再给他搞一个连带，10家，多少多少家，把他们分成一个排一个连，这样人口就比较好控制，历史上所谓的“编户齐民”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一个现代国家需要的一个工具。所以，确实战争对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是春秋战国的时候，主要想说明中国不是最早一开始就是一个国家。秦朝生存的时间非常短，汉朝的地图就变得比较大了，而且越来越持久。唐朝是第二股统一的潮流。之后你看又开始分裂了，大家对历史非常熟，我就不重复了。宋朝的时候，这几个分裂的国家就开始变大了，现在你就看到国家越打越大，然后变成几个大的国家，开始进行非常大规模的战争，战争规模变大以后，对资源的调动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你怎么供这个军队，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因为军队都住在北边，你把这个粮食调动过去，你看到很多经济制度、财政制度都是从这个里面发展出来的。然后就是蒙古帝国，一下子就全部征服了。接下来是明朝，明朝也非常有意思。我们这里有一个横线（图1），在大运河没有完全起来的时候，中国的首都基本上是东西这条线，就是西安到洛阳、开封这一条，一来一去的。然后到后来的国家变大以后，就看到更多的是南北这条线（图1），就是两都，北京、南京。明朝的时候最早实际上把首都建在南京。所以这个时

候就看到国家的势力开始蔓延到南部这一块，说明是一个内生的过程。



图 1：明朝——首都轴线转为南北向



图 2：明清时的中国

地理确实有很大的作用。你可以看到（图2），蓝的这一块基本上就是所谓以农耕为主的文明，蓝的之外基本上就是游牧民族，这对中国最后大一统的形成有很大很大的作用。最后的战争都是取决于这两股势力越来越扩大规模，基本上就是在长城的两边在打，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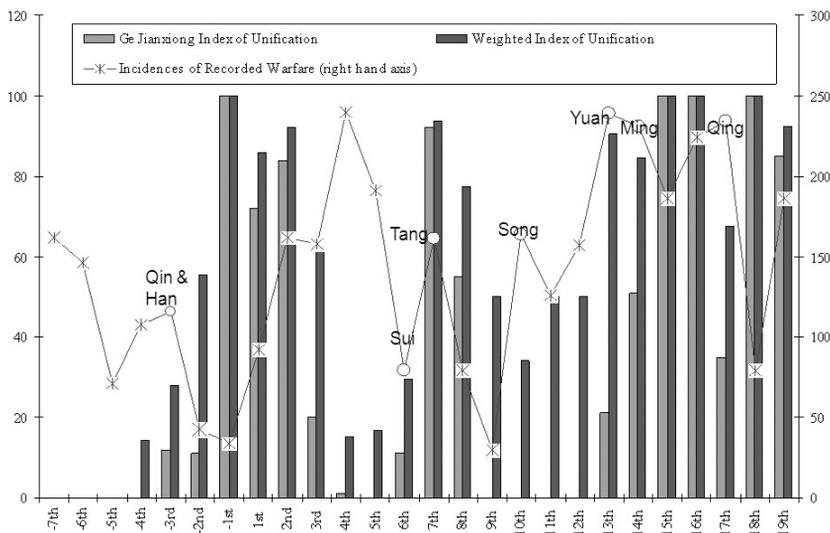


图3：统一与暴力的三个阶段

这个我就把它作了一个量化（图3）。我实际上是把葛剑雄文字描述的东西，给它做了一些分析。你就看到柱子，这个柱子是100的话，明朝只有一个皇帝，就是说它是100%的统一，低于100就是有不少其他皇帝。所以你就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秦汉是第一波统一的，之后马上就垮掉了。唐朝开始第二波，到了宋朝这个时候柱子比较低一点，国家是变少的，但是还是分裂的。但是有一个比较有

趣的现象，你就看元朝，元朝之后，明清基本上是走向统一的。因为当时葛剑雄老师他当时之所以引起很大的争议，那个时候一直在讨论统一和分裂的问题，他说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比统一的更多。按照他的计算方法，他一个一个计算出来的。他的说法没有错，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确实是分裂的时间比较多，但是你要看到了后面，统一的时间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持久，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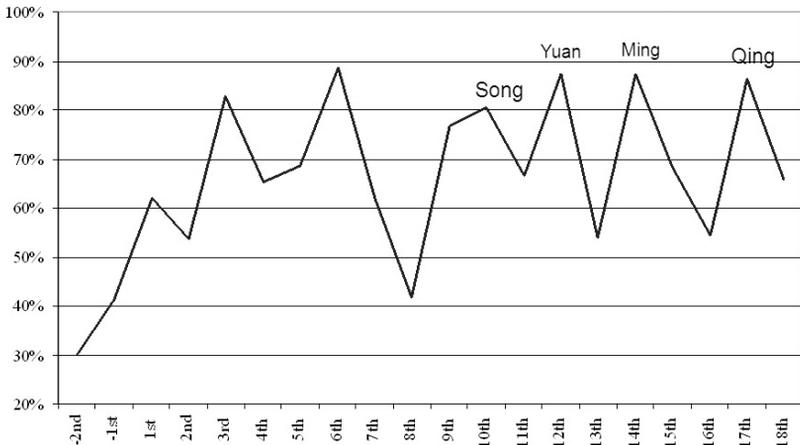


图 4：游牧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战争占当时全部战争的比例

战争你可以把它分成两种，一个是游牧民族和汉族打，一个是汉族跟汉族之间打。游牧民族和汉族之间的战争（图 4），这个曲线是这个战争的比例，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战争当中游牧民族和汉族的战争有时候占到 70%-80%，这也就是决定中国战争最重要的一个结构。比如说宋朝主要是跟游牧民族的拉锯战，元朝就不用说了，本身就是游牧民族。这一点你特别要看葛剑雄的书，两个的文明冲突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农耕文明建立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秦始皇秦始皇就开始有了，就像商鞅变革，通过建立军队，建立编户齐民，建立官僚体系，到后来就发展成科举考试这一套体系。你最后发现这套体系在游牧民族这里没有办法实现，除非这个游牧民族打进来以后。

大家可能也知道，中国历史上的首都大部分是在北方，只有两次是在南方，基本上都是在南京，一个是明朝，还有一个是蒋介石。蒋介石很多时候，就是孙中山很多时候，也要恢复明朝，要把外来的满族赶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家也可以想象到，皇帝当中有一半是外族人，不是汉人。陈寅恪做过研究，我现在忘记李世民他妈妈是什么少数民族，是鲜卑族的，而且李世民长期时间就呆在西北边境这一块，就是所谓的关中。那个地方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他的军队非常训练有素，所以那个时候他进来以后统一中国。长城这块就形成中国政治争夺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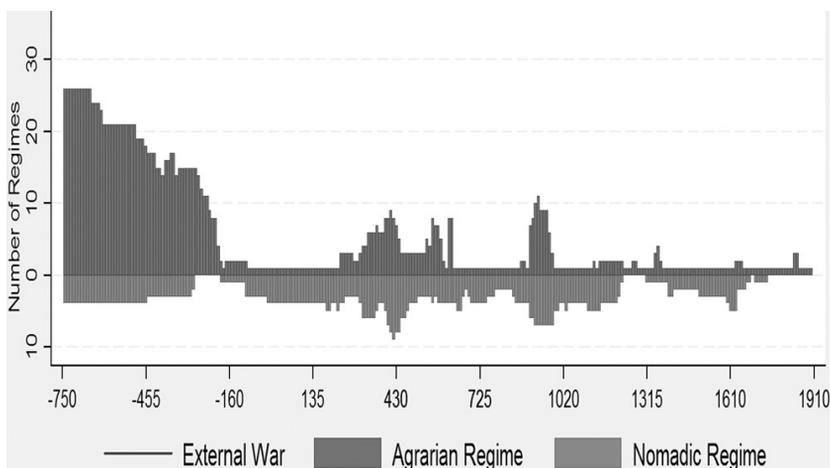


图 5：中国历史上的分裂状况

这个我们就做了更详细的（图5），下面绿的那部分就是游牧民族政权的数量，上面的部分是农耕政权的数量，这个和统一分裂的指数是相对的。每次分裂以后两个部分国家数字都在增加，但是很清楚的是，到了1020年之后，特别是蒙古出来之后，基本上统一的趋势变得越来越强大。

这个统一指数可以跟全球做比较，比如说欧洲根本就没有办法做比较，欧洲的国家太多了，你会看到欧洲的国家和中东的国家比中国都多。欧洲也确实有一个国家数字减少的过程，但是这个减少的时间要比中国多，中国基本上从宋朝以后开始国家减少，但是欧洲只是到近现代的时候才开始减少。所以说这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中国的大一统开始得早，持续得更长，国家的大一统程度也更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欧洲不光是国家本身分裂，国与国之间有很多国，国家内部的权利也不集中，国家内部基本上是分封制度，实际上就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带来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议会，这个议会就是当地各方面的土豪劣绅的代表，所以说它内部的权利分裂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我总结的时候要说，为什么欧洲这个分裂不能只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独立，其本身内在的制度跟其他分裂的国家不一样，其本身内部议会制度后来变得越来越强大。最早的议会发达的地方是在南欧，像意大利这些地方，后来这些地方的议会开始慢慢衰落了，到后来荷兰、英国这些地方的议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实际上对后来整个国家的兴起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这个只是把刚才的总结了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看，怎么来解释这个大一统对政治制度，特别是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大一统在中国产生一个很大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中

国比较早的贵族制度的消失，特别是有遗传性的贵族制度。欧洲在很长时间里有一个贵族血统，皇家血统，大家都是在内部结婚，搞联姻。这套制度在中国只有皇帝的权力是可以遗传的，其他基本都不可以遗传。这是非常非常大的特色。所以在欧洲你可以靠遗传，在中国你一定要靠能力，当然这个能力一定要打一个引号，是什么能力，这个是我们另外要讨论的问题。还有中国很早就开始所谓的直接税，土地税，人口税。中国很多情况下就像一个垂直的大型企业，它通过建立一个官僚体系，用一个等级制度来取代分封的制度。在西方的，特别是英国有普通法这个概念，普通法这个东西就是约定俗成的东西，这个约定俗成一旦到一定程度以后，特别是经过法官解释后就变成法律了。实际上中国也是有习俗的，但是中国没有很清楚的普通法传统，中国好像基本上只有皇权，没有什么共和国的概念。中国历史上讨论的是什么？就是郡县制和封建制的讨论，这实际上是中国某种形式的宪法讨论，就像柳宗元。最早比较有名的李斯，就是讨论是要搞郡县制还是要搞封建制，你统一的话可以搞郡县，就像现在官员是上面派下去的；还有一个是分封，给他一个独立的范围。这样中国就形成三个体系，一个皇帝，一个是官僚，一个是大众老百姓，这跟欧洲的政治架构已经不一样了。大家可能也知道，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唐朝很有名的大文学家柳宗元就写过《封建论》，毛泽东跟郭沫若对这个专门做过讨论。柳宗元那时候就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你们不要小看郡县，每一次叛乱的时候郡县的这些领导人没有叛乱过，叛乱的全是分封的人，所以说郡县对控制政权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还有，假如这个封建领主是个坏蛋的话，那就完蛋了；但是如果这个郡县的领导人是

个坏蛋的话，皇帝马上就可以换一个人，马上就把他撤掉，所以这个有很大的好处。当然也有很大的问题，柳宗元没有问到，后来的人就开始问了：如果皇帝是一个混蛋的话怎么办？韩愈那时候就提出，皇帝笨点没有关系，我给他一个聪明的宰相就可以了。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宰相就起了很好的作用。慢慢你就可以看到在封建和郡县制度之争当中，慢慢更多地导向了郡县制度。中国的皇帝从某种角度来讲，是没有所谓的宪政的制约，你要怎么样制约皇帝？除非就是造反，跟他打。

我最后想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坐寇和流寇的问题，这个可能就变得比较形象了。一个比较有名的经济学家他已经去世了，叫奥尔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他说的坐寇、流寇这个理论。他还在世的时候我听过他做报告，每个人做报告都像我这样有 PPT，他过来时就是两个手放在裤兜里，然后他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他说，以前有一群强盗，强盗经过一个村庄，把村民所有的东西都抢光，抢光了以后就跑掉了，能抢走的就抢走，以后再也不会回来。后来有时候这些强盗又重新再回去了，回去了以后还是跑到这个村庄再抢一遍。来回抢几次的时候就觉得，我下一次抢不要把它全抢光，我要给他留一些东西，我一下子抢光下一次再抢就没有了。而且时间再长了以后，强盗可能在山头上自己有一个窝了，就定期去抢，那个时候抢的时候特别小心，比如说生产资料给你留下，因为你要生产，而且有时候也给你做一些保护，然后甚至提供公共产品。流寇抢劫是最不讲究的，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抢光。但他一旦有长期的眼光之后，就会慢慢演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后来他就说强盗这个名字实在不好听，就改名字叫政府，然后他也不叫抢了，

就叫做税收。奥尔森从这里面实际上引申出很大的道理，从某个角度去看，你不要以为一旦这个人权力很大的时候，他就会把老百姓全部抢光，有时候恰恰相反，你给他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的话，他也会成为一个比较仁慈的君主。这对我们理解大一统君主就起了很大的帮助。皇帝要死了怎么办，死之前他就把它全部抢光了对不对？他就把这个皇位给传下去，传下去以后一直可以保持稳定。

我主要是从这个逻辑出发，来看中国这个大一统最后带来的各方面的好处。大家知道唐宋开始建设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因为你要是做一个皇帝的话，最大的问题是不希望别人来挑战。你是本地人，你就不能在本地当官，这表面上是为了防止腐败，其实不是，他是为了防止你跟当地势力的勾结，就是你一定要对皇帝忠诚，这个也很重要。然后慢慢的在唐朝、隋朝时，最早的科举制度起来，但是那时候的科举制度还不是公开的，特别是隋朝之前，中国还是贵族制度，贵族制度还非常大，包括像李世民这样的人。李世民做了皇帝以后，有一些其他的氏族比他的地位还高，宰相对他的制约很厉害，皇帝的财产是整个家族的财产，不是你个人的财产。到了宋朝以后，皇帝的权利变得更大了，到了明朝的时候是最大。明朝大家可能知道，把宰相都去掉了，特别是太监起很大的作用，因为太监的地位最弱，所以某个角度来说他对皇帝是最忠诚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从宋朝起科举制度真正成型，哪怕到元朝，到明清基本上没有断过。这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我想科举的重要我就不强调了，因为一个是文化的统一，文字的统一，这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是整个官僚制度的形成，对皇帝的忠实，对郡县制度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知县什么的都一定

要考取一定的品位才能做。

然后你去看税收就变得很有意思。假如你这个皇帝一旦固定下来，你每一次就会抢的少一点，清朝收的税只是宋朝的15%，就是中央的税，这是长期的数据。因为我也跟一些学者在整理比较长期的数据，然后你就可以看出来土地税占的比较高，这是农耕文明起了关键作用的一个制度，慢慢的就把它建立下来了，特别是一条鞭法以后，整个税收变成货币制度了，就是中国的税收基本上大部分是交银两了。所以说他对人口就开始不控制了。然后他因为是从土地开始征税，所以你看中国传统历史上，很长时间，特别是稳定的时间，对土地的产权有相当大的保护，民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土地贸易的交易，这个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这点很重要，在一个专制的大一统体系下，他完全可以有一个私有产权的产生。当然私有产权是比较有限的，他没有专业的法律人士来保护，这也是肯定的，他还是通过县衙门这套制度，但是某种程度上他是得到承认的，这个很重要。

到了清朝的时候特别明显。清朝的时候就说，我这个政府每年只收三千万银两，不能再多收了。清朝的税负是最轻的，当然这里面就牵涉了很多腐败的问题，但是真正到达中央手里的税收是非常低的。你看这个税收跟流寇、坐寇的逻辑（图6）。这个是战争的次数，就是他清朝刚刚开始时战争比例比较高，后来就平定了，平定了战争就开始下去了，然后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时候战争又上去了。下面那个红的是战争的数字，上面那个是什么呢？是清朝的户部的银库，户部就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所有上交来的税收的税银全部存在这个里面，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两个正好呈反比的关系。战争一旦多的时候库存就下降，因为它大量的靠中央拨

款去打仗，战争一旦开始恢复以后，库存开始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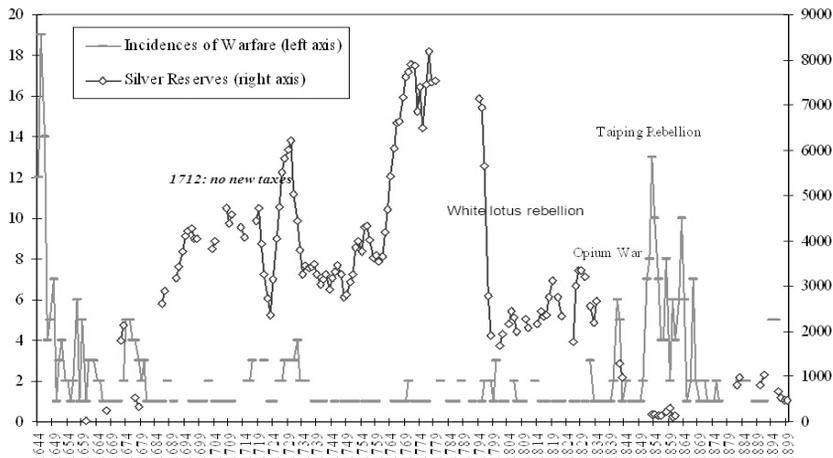


图 6：清朝年均战争次数与银库储备

上升以后就很重要，清朝就开始实行所谓仁政，康熙的话就非常有名，永不加赋，把税收全部固定在三千万两，就是人口增加了，土地增加了，我都不加税。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有的时候他免税，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收成不好，可以给你免税。他免税的时候正好库存开始大大上升，所以他这个仁政有一定基础。皇帝不是说我要全部，清朝的皇帝从各方面来说比明朝都要好多了，那时候像雍正也说说我们所有的皇宫比不上明朝的一宫。而且清朝对太监压制得非常厉害，明朝的时候太监非常猖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清朝是相对比较廉洁的小政府，有时候钱不够了怎么办，就通过卖官。

给大家做一个国际比较，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你看中国是这样一个大的独裁的体制，用收取了多少克银子来

算，中国是在最左边这块。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开始实行宪政，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实现宪政以后他的税收大大增加，他这个政府变得膨胀，国债什么全部飞涨。然后在鸦片战争的时候，你看每个人的税收，中国人的税收分摊在每个人身上只相当于英国人的 1% 左右，就是英国人要交中国人的 100 倍的税。然后你要把它算成工资的话，下面是把它算成工资，中国人当时一个成年男人交的税相当于他一天到两天的工作量，所以中央政府拿去的税是非常少的，当然这里面也许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再讨论，这里面牵扯很多吏治的腐败问题，老百姓真正被榨取的税可能更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中央财政的这个税在全国老百姓身上的负担是非常小的。这个吏治腐败的问题，我们呆会儿也许可以去讨论。

Per Capita Revenue in grams of silver							
	China	Ottoman	Russia	France	Spain	England	Dutch R
1650-99	7.0	11.8		46.0	35.8	45.1	
1700-49	7.2	15.5	6.4	46.6	41.6	93.5	161.1
1750-99	4.2	12.9	21	66.4	63.1	158.4	170.7
1800-49	3.4					303.8	
1850-99	7.0					344.1	

Per Capita Revenue in days of urban unskilled wages							
	China	Ottoman	Russia	France	Spain	England	Dutch R
1650-99		1.7		8.0	7.7	4.2	13.6
1700-49	2.26	2.6		6.7	4.6	8.9	24.1
1750-99	1.32	2.0		11.4	10.0	12.6	22.8
1800-49	1.23					17.2	
1850-99	1.99					19.4	

图 7：人均税收的国际比较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就看到作为仁政的一个最大

标志就是低税，然后政治上有高度的稳定，这个变成它很重要的一个合法性。然后特别是在清朝的时候，目标不再是我榨取越多越好，而是说我能让皇位延续得越长越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并不完全是靠榨取。法国最有名的启蒙家伏尔泰，他很长时间呆在伦敦，那个时候伦敦没有法国大革命，但是他就觉得英国的皇帝很早就被制约住了，法国的皇帝力量就非常大，所以说他是在国和国之间做比较。中国只有一个国家，没有办法做比较，但是刚才看到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可以进行朝代之间的比较，我比上一朝好多了。后来那些人改革，像顾炎武这些非常有名的人，就说这个郡县制已经完全衰败了，这些人改革的时候想到了什么？不是想到其他国家，而是想到汉代的时候，汉代的时候地方有更多的自制。

最后讲讲大一统以后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最后英国的财政能力大大上升，特别是它的公债能力大大上升？因为议会最后是由商人操纵，他们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后来也开始发行纸币，英格兰银行开始发行公债，英国的公债在当时欧洲是信誉最高的，这是英国能打败拿破仑的最坚强的财政基础。他这个钱大部分用来建设海军，这对他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国一旦有战争靠什么来解决？靠银库。银库是把钱从社会上收进去，放在仓库里，弄了一批太监在哪里看着，有时候还看不住，所以要经常查银库，查银库发现不对，就要抄家。那么一旦发生战争怎么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马克斯·韦伯也说起过这个问题。中国在应付危机这个方面的能力就变得非常差，一旦发生战争，有几种办法：一个就是卖官，就是把人家本来辛辛

苦苦考科举的东西，把它卖掉了，这样对整个制度的冲击就非常非常大，卖官的话当然这个官僚体系就变得更差了。还有一个就乱来了，就把那些大的盐商收集起来，或者干脆就抄家。皇帝缺钱时候就找个借口开始抄家。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就是在这种制度下，产权最后是不稳定的。这也是我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做欧洲经济史的人没有考虑的，你说公债有什么好，我们现在借公债是很糟糕的事情，你去看英国的公债最后借了干什么，都是去搞军事战争。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公债是有借有还，然后他通过普通老百姓的收购，他一旦有危机以后，不需要通过破坏产权这种办法来做，也就是说他不会由坐寇变成流寇，这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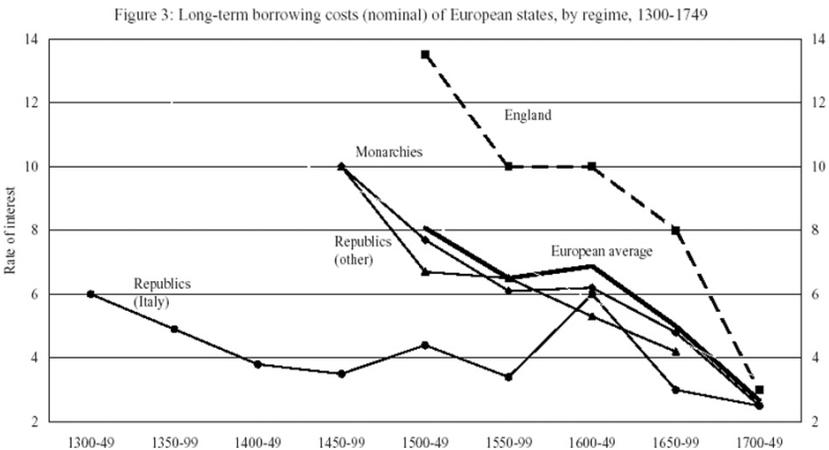


图 8：各国竞争下的欧洲的利息率

有个例子比较有名，这个是欧洲的长期利息率（图 8）。你看欧洲的利息率，到了英国一下子下去了，而中国的利息

就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所以这也提供一个很重要的解释，欧洲为什么后来走资本密集型的道路，因为他的资本变得更便宜了，他的资本市场在公债、股票市场的带动下变得更加发达了，政府背后就有一个可信任的承诺，这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我最后谈一下日本，刚才跟大家说过了，我在日本也呆过。日本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会发生？有很多人说日本原来是一个封建制度，更像欧洲。明治维新的实质是什么？明治维新的实质是把封建主义消灭掉，把它整个中央集权起来，建立一个比较现代的财政税收国家。他建立中央税收财政国家，用到的词全是中国古文里面的词。所以明治维新就是恢复皇帝。原来的皇帝已经不行了，把他放在京都，基本上没有人把他当回事。日本就恢复皇帝的概念，就跟我们以前西周、东周的概念是一样的。大家知道在西周的时候，皇帝也被架空了，下面的诸侯变得越来越厉害，但是那时候还承认名义上的皇帝。所以说日本封建制度也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他之所以能很快建设这个国家，就是把老的 ideology（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重新拿回来了，你看个这词完全是用的汉字，一模一样的汉字。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央集权这个制度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思想源泉，对了解中国以及东亚的研究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我想我已经讲的有点超过时间了。谢谢。

提问与讨论

乔依德：非常感谢马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演

讲。以往我们沙龙请了很多专家，一般会就当代的情况就事论事，或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情况。这一次马教授从历史上，特别把中国跟欧洲比较，从中国历代皇朝大一统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讲，至少我以前在这方面接触的比较少。下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大家也可以对他的演讲提一些问题。

吴建刚：我的问题是，我发现你讲的中国历史上的这些特点，好像延续到现在也还是有，那么中国以后的出路在哪里？

马德斌：实际上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考虑到很多问题，也就是现实的问题。我跟另外几个学者最近在美国的杂志上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做“从历史来看今天”。因为有很多说法，说清朝的时候就已经现代化了，根本不用什么改变。我们认为不是这样。但是你要看现在的很多制度、很多地方确实延续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官僚体系。这就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了以前没有这样的经济制度，将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传统上的很多东西，我们的人事制度跟以前非常像。还有一个财政，财政也是非常有意思，中国传统以来就是喜欢财政分包，其实你看清朝，他是财政分包，很多就是预算之外的财政。清朝以前更明显，它没有地方财政，全部是预算之外的财政，所以这个方面有很多相象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些东西又非常实际。那么我们怎么来解释今天的经济为什么会增长？首先今天有一点是不一样的，就是改革开放。现在你有什么问题不好，你不会跑到汉代去比较，我们现在要跟美国比，跟其他自由国家比，这样就会带来很大的动力，整个资源的调动全部就起来了。科举制度

也取消了，但是中国对学问的重视没有随着科举制度取消，包括像我这样的人被请来演讲。我那两个合作者都是美国人，我说 1980 年代的时候你能想象吗，中国在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时候，多少在乡下用蜡烛、煤油灯读书的知青都跑出来高考了，这个只能从中国文化传统去理解，其他国家你不能看到这么多东西。所以说对中国现在的人力资本起了重大的作用，就是劳动力的提高，政府的能力也大大增强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将来是怎么样的情况，我想这个问题，我刚才也是讨论了，可能一个大一统。有一些比较有名的研究，一个最有名的研究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文章，研究大跃进是怎么发生的。大跃进的发生跟中央体系下的命名起了很大作用，就是官员要提升。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学的回归，这个回归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省长，假如他是候补中央委员会的话，他收粮食最起劲，最后他的大饥荒就最厉害。所以说制度是能够非常有效调动资源的，但是假如这个路标错的话，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这也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须要考虑的。

缪其浩：谢谢马教授。我的问题没有那么宏大，你刚才有一个数字我很惊讶，就是清朝的时候中国每个人交的税是英国的 1%，那么你是不是还应该补充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的人口是英国的多少倍，这里有规模效应。

马德斌：我刚才说到英国的税收，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你现在去看一下，越是发达国家，越是民主的国家它的税收占 GDP 的比例越高。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规模效应，就是中国这个国家这么大。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背景，英国税收的提高，跟税收制度变得越来越有效率、越来越廉洁有很大的关系。英国税收机构是第一个垂直的机构，它是

全国性的机构，每个地方有分支，所以最后对英国的文官体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作用。这套文官体系后来特别是像德国全部复制过去。中国的税收有很大的问题，我们表面上看税收很低，但下面的层层包税，然后乱收税，这个问题在当时非常非常麻烦。下面没有预算，这种例子非常多了。衙门派几个人去抓人，但连路费都没有，那么他怎么办呢？他跑过去先抓富人，他很来劲，马上就跑过去了，过去了以后把人抓过来了，马上上枷锁，一上枷锁富人家里的人都哭了，说不行，求你仁慈一点。衙门的人说，行，你给我一个解锁费。在这个情况下，政府权利的滥用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西方文官体系对政府权利的滥用造成了很大的制约，也就是老百姓的税收知道是交给了政府，而不是交给了当中的中饱私囊，这一点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所以你为什么会看到荷兰、英国这些议会最强的地方，它的税收变得最高。

陆德明：马教授你好。国家制度与经济的关系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我也很有兴趣，听了很受启发。我以前探讨的是国家的规模问题、国家的管理成本问题，或者是国家的规模与经济的关系，但是后来没有量化下去，所以听了以后我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

第一，你说了大一统的国家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但是，你是不是研究过大一统国家的管理成本问题，是不是有规模经济的存在？如果说这个问题成立的话，那么中国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如果要降低它的管理成本的话，是不是应该划小管理单位，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与中国形成对比的是欧洲，你也反复与欧洲比较。欧洲是几十个小国组成的，从一个层面看是小国的经济，因为是小的，所以管理有效，成本也降低了。但是又付



出了代价，就是外部不经济了，市场过小。如何看待欧洲目前在超国家层面上追求大一统，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欧洲未来也会走向大一统的国家政权？

马德斌：这个问题也问得非常好，特别是我现在生活在欧洲。我在美国一共呆了 11 年，你比较这三个地方就是很有意思的。美国当然最早是一个欧洲制度的翻版，美国也是大一统国家，但是美国是联邦制度。美国最早的时候是模仿欧洲的多国制度。只是到后来以后美国独立以后觉得不对，就是马里兰州和新泽西州要打仗了，因为内部的问题不能统一。还有美国那时候不像现在了，美国没有海军，那个时候大英帝国的海军非常厉害，所以美国的商船谁都可以去抢，所以那个时候慢慢地美国联邦党人起来以后，发现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同时给地方一定的自治，州基本上还是跟国家的概念很像，州的自治权利是非常大的，州长都是自己选的，也有自己的州税等等，美国是介于两者之间。欧洲的话，你现在看到的问题就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事情是 30 年轮回转。欧洲最好的例子就是欧元，欧元英国没有加入，现在在那拼命笑，因为现在英镑非常好，整个英国的经济也非常好。欧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欧元最大的问题是建立了一个货币联盟，它的货币体系统一了，但是它的财政没有统一，所以说希腊的经济和德国的经济完全是两个体系，财政制度更加不一样。结果希腊的经济不行以后把整个欧元都拉下去了，美国都是美元，你加州不行的话，其他的州不会造成这样的经济危机的问题。欧洲当然不会放弃走向一个大一统。美国最初有一点非常聪明，他是从欧洲学来的，就是州与州之间不能有关税，他就是要有一个统一市场。欧洲以前很大的问题，就是国家之间的关

税非常厉害，所以成了一个分割的市场。后来欧盟体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中国最诱人的一个地方恰恰是一个大一统，而且中国差不多 11 亿人口基本上是一个单一民族，单一语言，这个你在其他地方就很难。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历史这么悠久，最后大家能够都说普通话。我在欧洲感觉特别明显。你在美国的话，你在这个州工作不高兴，换个州去做，没有问题。但你在欧洲的话，你从西班牙跑到德国，换个工作就不那么容易，你要适应语言，还要适应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大一统能带来市场上的很多好处。

乔依德：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提一个问题。我有这个感觉，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拿中国来说，你前面讲了大一统也会带来很多好的一面，像现在市场，但是另外一面可能不像美国一样有州的自治。我想起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其实毛泽东提出过要研究美国的联邦制，他是当时提出来的，但是对现在的问题还是有现实意义。最近中央要通过财政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央财政跟地方财政的一个关系问题，你觉得以你的理解，应该从哪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

马德斌：我倒可以把你这个问题跟刚才陆老师的问题联系起来一起说，这个很有意思，有很多悖论在里面。中国有些地方是非常先进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日本学者叫内藤湖南，学历史的都知道，这个人实际上为后来日本侵华提供了理论根据。但是这个人是一个中国通，而且对中国的文化感情很深，他认为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就说中国很早就进入现代社会了，中国把贵族取消以后，宋朝以后就是现代社会了。比如说科举制度，使得非常有能力的贫民能够

坐上很高的职位。这个在欧洲是很难想象的，英国的 class（等级）是非常厉害的，后来才慢慢改掉了。中国表面上非常像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但又有悖论，因为真正的财税制度在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起来过，直到后来朱镕基的改革。美国的联邦储备制度，它的货币制度是一个联邦的中央制度，它就特别小心，它与州是分开的，不是与州叠在一起的。现在你看中国银行分行也开始分开了，这实际上就是慢慢地把联邦和地方的权利弄清楚了。税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中国表面上看上去有一个现代的财政制度，但实际上它没有一个文官制度，最后文官之间都是裙带关系，都是靠个人关系，所以这里边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悖论。你刚才提到毛泽东，实际上我也想到很有意思的一点，大家可能知道毛泽东在一九二几年的时候说湖南应该独立。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也做过这样的尝试，在军阀战争的时候各个地方都有这种要独立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怎么样把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好，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最好的办法，怎么处理好在是一个要小心、慢慢走的一个问题。

乔依德：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想我们这个演讲就到此结束，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马教授的演讲表示感谢。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